

## Linking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edited by Tiziana Lippiello, Chen Yuehong 陈跃红 and Maddalena Barenghi

# ‘中国’之义：文中子的立身与存心 The Notion of ‘Zhongguo’: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Wenzhongzi

Zhang Pei 张沛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Wang Tong (584-618) (also known as Wenzhongzi), one of the greatest Confucians in Chinese history,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figure. *Zhongshuo* (Doctrines of the Middle Way), is the only extant text that records his teachings. Focusing on this work, the present paper illuminate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Wang Tong as shown by his outlook on Zhongguo; furthermore, it contends that this approach is cultural rather than geographical or ethnological and that it is representative of classical Confucianism.

**Summary** 1 上篇.- 2 中篇.- 3 下篇.

**Keywords** Wang Tong. Master Wenzhongzi. *Zhongshuo*. Doctrines of the Middle Way.

王通歿后，《续经》湮灭无闻<sup>1</sup>，仅《元经》与《中说》传世。《中说》一名《文中子》，原为王通门人问学记录<sup>2</sup>，由胞弟王凝整理成书，王福峙（王通第三子）编为十卷（时在贞观十九年至二十三年，即公元645-649年之间），而后刊行于世<sup>3</sup>。今本《元经》系后人伪作，不足为信；《中说》虽有窜乱，大体尚真<sup>4</sup>，《续经》之义、河汾之学犹可得而闻焉。是故“文中子”一名有三义焉：一曰王通其人（文中子）；一曰《中说》其书（《文中子》）；一曰河汾之学（如《续经》之具见《中说》者）。本文即以《中说》为蓝本，由此而论“文中子”之中国观。

1 唐人言《续经》大多语焉不详，想来未见其书。北宋司马光称“今其六经皆亡”（《文中子补传》），已有定论；而后张未称“读通所著《续经》”云云（《答李文叔为兄立谥简》），又似其书尚在；更后洪迈称“《元经》、续《诗》、《书》犹有存者”（《容斋四笔卷第十一·讥议迁史》），盖犹有残篇存世。莫名究竟，录此以待方家考证。

2 王凝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10.28）杜淹告王凝：“昔门人咸存记焉，盖薛收、姚义缀而名曰《中说》。”（《王氏家书杂录》）阮逸《中说序》：“《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文中子世家》：“（王通）寝疾七日而终。门弟子……丝麻设位，哀以送之。礼毕，悉以文中子之书还于王氏。”

3 李翱曰：“其理往往有是而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刘氏《人物表》、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书》是也。”（《答朱载言书》）是知《中说》中唐前已行于世。

4 李翱曰：“其理往往有是而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刘氏《人物表》、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书》是也。”（《答朱载言书》）是知《中说》中唐前已行于世。

## 1 上篇

《续经》为王通平生最大著述，包括《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六种。《续经》既成，王通慷慨陈言：

甚矣，王道难行也！吾家顷铜川六世矣，未尝不笃于斯，然亦未尝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则以志其道也。盖先生（按：此言其六世祖王玄则）之述曰《时变论》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按：此言其五世祖王煥）之述曰《五经决录》五篇，其言圣贤制述之意备矣。晋阳穆公（言其四世祖王虬）之述曰《政大论》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按：此言其三世祖王彦）之述曰《政小论》八篇，其言王霸之业尽矣。安康献公（按：此言其祖王一）之述曰《皇极说义》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铜川府君（按：此言其父王隆）之述曰《兴衰要论》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1.1）

异日又告弟子董常：“吾欲修《元经》，稽诸史论，不足征也，吾得《皇极说义》焉。吾欲续《诗》，考诸集记，不足征也，吾得《时变论》焉。吾欲续《书》，按诸载录，不足征也，吾得《政大论》焉”。董常问：“夫子之得，盖其志焉？”曰：“然”。（1.2）是则《续经》非一人一时之作，实王氏七代继志戮力而成。

王通自云：“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2.33）又曰：“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6.29）此其著述大旨。王氏以圣人自任，乃以《元经》拟《春秋》，每将二书并举。如其谓仲弟王凝：“汝为《春秋》、《元经》乎？《春秋》、《元经》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失则无所取衷矣”。（3.25）又称：

1. 《元经》天下之书也，其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此《元经》之事也。（8.11）
2. 《元经》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穆公之志也。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以明中国之有代，太和之力也。（5.47）

王通之“正名”，即正中国之名，以明中国之道。

考诸古籍，“中国”实具二义：一曰中国之地，一曰中国之道。中国之地，乃就四方而言之天下之中。如《礼记·王制》所称：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中国之道，谓人文之中。如《战国策·赵二》记赵公子成语：

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再如《法言·问道》设为宾主问答：

或曰：“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

夷狄而行中国之道，则夷狄为中国；中国而行夷狄之道，则“中国亦新夷狄也”（《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是故中国之为中国，不在居中国之地，而端在行中国之道。

行中国之道，在建人文之中。《易·贲卦·彖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国语·周语下》记单襄公语：“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经纬不爽，文之象也。”再如孔子称尧：“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称周公：“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八佾》）是知“文”因人而称，实即“人文”。按《易·说卦》：“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礼记·丧服四制》：“仁义礼智，人道具矣。”是“人文”与“人道”同义。人居天地之中，如《易传》所说：

1.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系辞下》）
2.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系辞上》）

故“人道”又称“中道”。“圣人成之”，意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卦·彖传》）；此圣王事业，即所谓“王道”。王通曰：“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元经》可得不兴乎？”薛收曰：“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不其深乎？”出告董常，董常曰：“仲尼没而文在兹乎？”薛收曰：“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1.8）秉持“斯文”，所以建有“皇极”。《尚书·洪范》：“皇极：皇建其有极”。孔安国传：“太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是知“皇极”即中道（大中之道），亦即“王道”。荀子曰：“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荀爽曰：“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后汉书·列传第五十二》）王通则曰：“王道盛则礼乐从而兴焉”。（3.1）又曰：“礼其皇极之门乎？圣人所以向明而节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辩上下，定民志”。（6.26）居家不暂舍《周礼》，曰：“先师以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8.14）王通歿后，弟子会而议曰：“夫子生当天下乱，莫予宗之，故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圣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毕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请谥曰文中子”。（《文中子世家》）斯文在兹，故曰“文中”；人文之中，即是“中国”。王通以大中立言，为中国说法，此其所以为“文中”也。

## 2 中篇

自晋永熙元年至隋开皇九年（公元290-589年），三百年间南北分立，中国不一。北朝为异族政权，史称“五胡乱华”；然隋乘魏、周之势统一中国，俨为华夏正统，于是乎有“南北之疑”。王通自称“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6.29），即在判定正统以为中国说法。判之之法，首曰“天命”：

1. 《元经》天下之书也，其以无定国而帝位不明乎？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归，此《元经》之事也。（8.11）
2. 《元经》抗帝而尊中国，其以天命之所归乎？（8.15）

王氏所说“天命”，非上天之耳提面命，如“天命玄鸟”、“昊天有成命”之类，实称人德而言：

子述《元经》皇始之事，叹焉，门人未达。叔恬（按：王凝字叔恬）曰：“夫子之叹，盖叹命矣。《书》云：天命不于常，惟归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怀之，三才其舍诸？”子闻之曰：“凝，尔知命哉！”（1.10）

按“皇始”乃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年号（公元396-398年）。皇始二年拓跋珪平灭后燕，统一北方。“天命不于常，惟归乃有德”引用《尚书·咸有一德》伊尹语：“天难谄，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又《大禹谟》：“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施行仁政而得民心，此之谓“有德”。得民心者得天下：

1. 或曰“苻秦逆”，子曰：“晋制命者之罪也，苻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齐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晋制至私之命，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纣，齐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晋之罪也，苻秦何逆？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4.12）
2. 子曰：“苻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4.13）
3. 董常曰：“《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7.10）

所

谓“苻秦”指前秦苻坚，“元魏”指北魏拓跋氏。孔子尝告弟子：“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王通称苻秦、王猛，犹孔子之许齐桓、管仲。“应天顺命、安国济民”、“天地有奉，生民有庇”，此王者之道，亦即中国之道。行中国道者，可为中国之主；主中国者，不必中国之人。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王通断南北而“帝元魏”、“尊中国而正皇始”（10.9），遥契孔孟之心。

宋儒严夷夏之防，故于王通之帝元魏不无訾议。如欧阳修曰：“夫帝王之统，不容有二。而论者如此，然缙绅先生未尝有是正之者，岂其兴废之际，治乱之本难言与？……文中子作《元经》，欲断南北之疑也，绝宋于元徽五年，进魏于太和元年，是绝宋不得其终，进魏不得其始”。（《原正统论》）南宋林夔孙更称：

《玄经》（按：即《元经》）尤可疑。只缘献帝（按：当为“献公”之误）奔北（按：奔北者为“穆公”，即王通四世祖王虬；“奔北”指公元479年即齐高帝建元元年、魏孝文帝太和三年王虬自齐奔魏），便以为天命已归之，遂帝魏。（《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七·战国汉唐诸子》）

后人对此曾有辩驳，如明人郑晓以为：

《春秋》谨华夷之辨，中国有主也。文中子帝元魏未为非。（《今言》卷一）

清人钱曾称：

《春秋》抗王而尊鲁，《元经》抗帝而尊中国。文中子之孝文犹帝魏也，殆夫子之遗意欤？宋儒高谈性命，不达经权，数百年来抹略其书，无有扬之如司空表圣、皮袭美其人者，可不叹乎！（《读书敏求记卷三·元经薛氏传十卷》）

李慈铭亦曰：

夫通生于元魏，不帝魏而将谁帝乎？且舜生东夷，文王生西夷，然则舜与文王亦当绝之中国乎？（《越缦堂读书记·集部·别集类·升庵集》）

盖时势有异，故立论不同，此且不言；而王通岂真“绝宋不得其终，进魏不得其始”乎？按宋“元徽五年”（公元477年）即魏太和元年，是年萧道成废刘昱，两年后齐代宋立。王通自云：“晋、宋之王，近于正体，于是乎未忘中国，穆公之志也。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以明中国之有代，太和之力也。”此其所以“绝宋于元徽五年，进魏于太和元年”。再如王通因穆公奔北而帝魏之说，亦不尽不实。《中说》记载：

1. 子之家庙，座必东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国”。（4.16）
2. 裴晞问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闻凤皇乎？览德晖而下，何必怀彼也？”叔恬曰：“穆公之事，盖明齐魏”。（7.17）

所谓“明齐魏”，即“明中国之有代，太和之力也”。王通又云：

1. 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国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5.12）
2. 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关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10.1）

穆公之奔魏，盖“览德晖而下”，然“未忘先人之国”；王通之帝元魏，盖“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国之有法”，然又惜其“不得行穆公之道”，以为“信美”而“未光”（7.6）。王氏之家国情怀如此。故王通之帝元魏，初不在穆公北奔，实以大中为心而不得不然：

1. 薛生曰：“殇之后，帝制绝矣，《元经》何以不兴乎？”子曰：“君子之于帝制，并心一气以待也，倾耳以听，拭目而视，故假之以岁时。桓、灵之际，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际，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书同文、车同轨，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后，君子息心焉，曰：‘谓之何哉？’《元经》于是不得已而作也”。（5.50）
2. 董常曰：“敢问皇始之授魏而帝晋，何也？”子曰：“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我闻有命，未敢以告人，则犹伤之者也。伤之者，怀之也。”董常曰：“敢问卒帝之，何也？”子曰：“贵其时，大其事，于是乎用义矣”。（7.10）
3. 叔恬曰：“敢问《元经》书陈亡而具五国，何也？”子曰：“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永嘉之后，江东贵焉，而卒不贵，无人也。齐、梁、陈于是乎不与其为国也。及其亡也，君子犹怀之，故书曰‘晋、宋、齐、梁、陈亡’，具五以归其国，且言其国亡也。呜呼，弃先王之礼乐以至是乎！”叔恬曰：“晋、宋亡国久矣，今具之，何谓也？”子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尝有树晋之功，有复中国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齐、梁、陈以归其国也。其未亡，则君子夺其国焉，曰：‘中国之礼乐安在？’其已亡，则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人也。’叔恬曰：“敢问其志。”文中子泫然而兴曰：“铜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废。书五国并时而亡，盖伤先王之道尽坠。故君子大其言，极其败，于是乎埽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为恤’，汝知之乎？此《元经》所以书也”。（7.13）

《元经》“天下之书”（8.11），王通于此为大中立言，故属意江东而不得不尊中国，伤怀南土而不得不帝元魏。苦心孤诣，岂“弃亲昵而媚豺狼，悖逆至此”（章太炎：《葑汉微言》）<sup>5</sup>一语可以了得！叶适谓其《续经》以圣人之心处后世之变”（《水心别集卷八·王通》），王阳明言其“良工心独苦”（《传习录·上》），近人汪吟龙亦曰：“推文中子之用心，曷尝一日忘中国哉！民怀戎狄之语，叔恬盖有慨焉。文中子世仕北朝，伤心礼乐。《元经》之作，实具苦心”。《与章太炎论文中子书》皆是解人知言<sup>6</sup>。

5 章氏感激时事，故有此说；然其厚诬古人，实不足为训。

6 汪吟龙：《文中子考信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6页。

## 3 下篇

有宋一代，文治远胜武功，此史有定论。其时中国积弱，强敌环伺，于是宋儒大夷夏之防以自持<sup>7</sup>。王通断南北之疑，正皇始而帝元魏，其不为宋儒所喜，自是意料中事。然宋儒又视王通为道统中人<sup>8</sup>，几乎众口一词。如宋初柳开以为

1. 隋之时，王仲淹于河汾间，务继孔子以续《六经》，大出于世，实为圣人矣。（《补亡先生传》）
2. 昔先师夫子，大圣人也……厥后寝微，杨墨交乱，圣人之道复将坠矣。……孟轲氏出而佐之，辞而辟之，圣人之道复存焉。……孟轲氏没……再生扬雄氏以正之，圣人之道复明焉。……扬雄氏没，佛魏隋之间，讹乱纷纷……重生王通氏以明之（下略）。（《答臧丙第一书》）

稍后宋初三先生之孙复、石介声言：

3. 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孙复：《信道堂记》）
4. 传曰：“五百年一贤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扬子，扬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其验欤？（石介：《上赵先生书》）

理学宗师程颐自称：

1. 昔汉武笑齐宣不行孟子之说，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汉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于道，而不听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尝笑之矣，臣虽不敢望三子之贤，然臣之所学，三子之道也。（《上仁宗皇帝书》）

朱熹虽谓文中“其学之不足以为周、孔”（《王氏续经说》），然而又云：

1. 荀卿之学杂于申商，子云之学本于黄老，而其著书之意，盖亦姑托空文以自见耳，非如仲淹之学颇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实也。（《王氏续经说》）
2. 邹汾（按：即孟子、王通）断简光前载，关洛（按：即张载、二程）新书袭旧芳。（《抄二南寄平父因题此诗》）

是亦推许有加<sup>9</sup>。同时提倡事功之陈亮，史称其学自孟子之后惟推王通”《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五·儒林六》朱熹曾言陈同父（按：即同甫，陈亮字）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心学宗匠陆象山亦称：

由孟子而来，千有五百余年之间，以儒名者甚众，而荀、扬、王、韩独著，专场盖

7 “自持”兼自认(self-identification)与自张(self-assertion)之意。西方哲人称为政要在分别敌我(参见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6-107页),宋儒严华夷之辨,用意正同。

8 以文中承接儒家道统始自晚唐皮日休。如其曰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曰:又曰:“复乎千世,而可继孟氏者,复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讳通……较其道与孔孟,岂徒然哉!”《文中子碑》然文中子道统地位之底定实在宋代说见下。

9 李光地曰程朱身分高,又见得到,直眼大如箕。三代下所推者,不过几人:董江都、诸葛武侯、文中子、韩文公,余则称陆敬舆、郭汾阳。”《榕村语录》卷二十二可为旁证。

代，天下归之，非止朋游党与之私也。（《与姪孙浚书》）

非特如此，宋代科考兼用策论，南渡之后尤以策论取士；据《宋史·选举志》载：

绍兴元年，初复馆职试，凡预召者，学士院试时务策一道，天子亲览焉。……凡应诏者，先具所著策、论五十篇缴进，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为三等，次优以上，召赴秘阁，试论六首，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扬》、《管子》、《文中子》内出题，学士两省官考校，御史监之，四通以上为合格。

是则文中子之学不但为士林所重，更列入国家考试经典。今以王十朋（绍兴二十七年丁丑科状元）、陆象山（乾道八年进士）二人策论为例：

1. 后世有大儒王通者，鸣道河汾间，与弟子难疑答问，动以洙泗为法。《中说》十篇，犹孔氏《论语》也。（王十朋：《策问》）
2. 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子最著。（陆象山：《策问》）

窥斑知豹，犹可想见当时风习之盛。宋以积弱偏安之国而如此推重帝元魏之王通，岂非咄咄怪事？按儒家崇尚文德，以武功为次，所谓“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古史载禹征有苗，三月而苗民叛；舜敷文德，七旬而有苗格（《尚书·大禹谟》）。孔子称之：“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又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季氏》）孟子亦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所谓“文德”，即人文大中之道，说已见上。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斯文在中，是为“中国”。千百年来，其说深入人心；宋室偏安一隅而自居中国，根源即在于此。文中子为大中立言，宋引为奥援，又何足怪哉！

孔子论政，以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言国家当取信于民。取信之方，“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荀子·天论》），如“天命”、“五德终始”即是，“正统”、“道统”之说亦然；以今人视之，则亦不过当时之“国家（民族）意识形态”而已。国固不可无信，否则人心涣散，必将土崩鱼烂而后已。虽然，国家欲取信于民，唯当以可信者信之，所谓“有诸己而后求诸人”（《礼记·大学》）；不可信而欲人信，不自信而强人信，则不过愚而暴而已，此又不必烦言也。